



平凡的轨迹

王季平 著

一、我的家乡、我的幼年

不知为什么，人老了，时常对家乡和幼年有一种思念，从心底悄然浮起。尽管我的家乡并非名胜之地，我的幼年也无可炫耀之处，但这种怀乡思绪却常常萦绕于怀。与其受其纠缠，莫若将之重新回味一番……

1916年11月5日（民国五年农历十月初十），我出生在河北省曲周县河东村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。

曲周县城傍依于逶迤蜿蜒的滏阳河畔，因“邑在河之曲，水旋如周”而得名。疏密参差的砖墙瓦舍，滏水环抱东南方，沿河两岸隐现在浓郁的树荫之中，河东、河西、东关被两座古朴的大石桥连为一体，构成一座跨水而踞的市廛。凝重的古城墙亘于县城四周，墙下一条清澈的护城河淙淙流淌，与滏阳河相通。在东城门的瓮门上，有座关帝庙，从这里可登上城墙游览。站在此处眺望，脚下护城河边杨柳依依，远处阡陌纵横，麦浪起伏；滏阳河水如一带碧泓远逝天际，河上帆影幢幢，舟楫往返，煞是一番景色。

这里历史悠久，据县志记载：西汉时，汉武帝封功臣驷商食曲周一千七百户。日后逐渐拓展繁荣，蔚成县治。自封建社会开科以来，在各朝各代，曲周都曾出过一些名人。城里南街有个忠愍祠，是纪念北宋末年吏部侍郎李若水的祠堂。靖康二年，金兵攻破东京（今开封）李若水随钦宗到金营议和，金军逼钦宗改换服装，为扈帝不受辱，他破口大骂金师粘罕，被割掉了舌头，仍怒目以血口喷射敌人，直至被杀，一直传为佳话。在其祠门两侧

有一幅对联：“三寸舌不让北国，一片心只为南朝。”唐初政治家，“贞观之治”期间的著名的谏臣郑国公魏征，一说是曲周人，一说是馆陶人，不过在两县里都没有任何遗迹。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又出了一个兵部尚书王一鹗。相传，戏台上唱的《玉堂春》中的王金龙就是他的三公子。早年，王家在我们县城内是一大望族，很有势力。听老一辈人讲，在过去，《玉堂春》这出戏在我们家乡，被认为是亵渎祖宗之作，一直是被禁演的。到我上小学时，王家已败落下来，他的嫡系家族中仅剩一刻字铺，但在城西还有一个占地百亩的王坟，里面有许多石人、石马、石狮子和石牌坊。那时我经常与同学一起去那里的石碑上捶字贴。在坟地后面还筑有一座土山，常有狐狸出没，流传出许多故事。

滏阳河上游通磁县，是煤炭、瓷器的产地，下游入大沽河，可直达天津。在平汉铁路通车前，自然形成水陆码头，具有交通衢口之势。河边常停泊着几十只木船，装货卸货，忙碌不休。但由于人口众多，耕地少而瘠薄，除几户地主外，大多数居民只好靠水吃水，以出卖劳力和从事小商小贩为生。集镇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店铺：有经营粮食的，有经营煤炭的，有经营瓷器的，有卖京广洋货的，有出售日用杂品的，还有开客栈、饭店的……生意很是兴隆。每逢集日、庙会，四乡百姓纷纷云聚市井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热闹异常。人称曲周好东关。

我家住在河东村后大街花园胡同，紧靠滏阳河畔，左右邻舍有二三十户，全都依靠装船卸船、装车卸车、肩扛、担挑为生。在大忙季节，干一天活可挣个块儿八角银洋，全家老小就靠此收入买米买面。还有几户是卖豆沫、卖花生仁、炸油饼的，晚上清闲时，他们聚坐在一起，唱着梨花大鼓，也很有风趣。

我父亲先是一个学校的文书，后是小学教员，不善与人交际，俭朴持家，尽管收入微薄，三顿饭尚能吃饱，在我们胡同内

可称首户。

我母亲是个孤苦的女人，早丧父母，又无兄弟姐妹。她信奉南海观世音菩萨，天天焚香跪拜，以此作心灵上的慰藉。日常她除操持家务外，总是坐在一架笨重而又简单的织布机上，双手忙个不停地递送着木梭，双脚费力地蹬踏着，咔嚓咔嚓的织布声响个不停。常常在夜里，她仍凭借着一盏悬挂在织布机上的小油灯，不停地织着，每一匹布她都要织很久。在上机前，她要纺线，缠穗子，浆染蓝色作准备。每当我看到一根根蓝白棉线经过她灵巧的双手，织成一块块光滑的“斗文”或“竹节”棉布时，我感到那么的新奇。我十来岁时常帮助妈妈纺线、缠穗子、生煤火炉、做饭。她的劳动成品，除供我们全家穿用外，大都卖到了布市上去，既可以赚点钱，补助我父亲的收入，还能挤出一点钱来，购买一些香烛作敬神活动。

1923年，我七岁时，父亲送我入了曲周县第一模范小学读书。校址在城内的文庙，院内古柏参天，有许多大小石碑。在三门前，有一条用砖砌在地下的月牙河，修建得短小玲珑，上面并排着三座雕塑精美的小石桥。在南边有一片草坪，矗立着一座木牌坊。三门上有两根滚龙柱子，深隽的雕刻工艺，活龙活现，很有艺术价值。这座大院南面临街，被一座大影壁墙隔离着。据说如果县里出了状元，才允许打开辟为正门。院里幽静、安谧、肃然的气氛与庙外喧嚣的市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校内有六个班级，二百余名学生，教师均为全县学问较深的先生，课程主要有：国文、算术、修身、音乐、体育等。当时情景，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天午、晚放学时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列队在文庙的三门中间，吹打着嘹亮的洋鼓洋号，庄重地把我们送出校门，我们则按着家庭住处，排成几条长队，高高兴兴地走回家中。每当集日，各地来赶集的人，都争相聚拢在校门两边观看，使我们感到

格外神气。由于文庙为圣人之地，每年祭圣节日，县长都要带领全县官绅名流，抬着整猪整羊，前来祭孔，我们也就在教师的率领下，怀着一种敬畏心情，在传统的仪式中，陪伴着叩拜。每次祭奠之时，在我幼稚的童心里，似乎总有一种神圣而虚幻之感，不禁也做出一种成人般的肃穆之容。

1926年，当我考入曲周县国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头一年，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曲周，县政府慌忙随奉军撤离，许多有钱的人家也逃之夭夭。其实北伐军并未在我县逗留多久。给我留有印象的事，只是军队中男女到滏阳河里洗澡，在那封建意识浓厚的社会里，我第一次看到男女赤身裸体在一块洗澡自然是件罕事，看稀罕的人群，亦云集在河岸上，噉噉喳喳，议论纷纷。北伐军撤离后，乡下的各种会道门蜂涌入城，霎时成了“大刀会”的天下，机关都停止了办公，学校都停止了上课，陷入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，我被迫辍学，只好在家帮助母亲干点零碎活计。直到翌年夏季伊始，新政府成立，局势渐稳，才得以重新考入第一高等小学校。在我们班级里我的考试成绩，每季都名列前茅。

1930年夏，我于高小毕业后，便随70名左右新老同学一起怀着兴奋的心情，经一天半步行，一路嘻戏地来到邢台北关客店投宿，报考省立邢台第四师范学校。由于师范学校不收学费，而且每月还有几元钱津贴，除膳食费用外，还有节余，这对于象我这样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报考的学生有几千名，录取80人。学校对考生要求非常严格。经过紧张的初试、复试，还进行体验。我县同学中，只有我一个有幸被录取了。同伴们因在考试中落榜，就匆匆地各奔东西。我回家时是孑然一身，冷冷清清的默默于归途。

二、拉神像、剪发放足

1926年，我从小学毕业后，就考入了曲周县第一国民高等小学。当时的校址，设在城内东街文昌阁，是一处幽雅恬静的庭院。由于文化落后，在我的家乡，考入高小是件了不起的事，被看做洋秀才，受人羡慕。

清朝虽然已经被推翻多年了，可是曲周县毕竟属于穷乡僻壤，许多身穿长袍马褂的男人，仍然留着长长的发辫，一些纨绔子弟在发辫尾端还系着红丝线缨子，扭扭搭搭的女人也还裹着“三寸金莲”。剧烈的社会变革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，他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对神灵的祈祷之中，辛亥革命的胜利，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一场改朝换代。只有县衙之中头戴花翎身穿袍靴的大人，变成了穿中山服皮鞋的官员，国民党县党部在县城里东福记楼挂着牌子，一副新潮派，男男女女出来进去显得趾高气扬，至于这些人在曲周的作为，在群众中并没引起好感。我记得有人传说，在县党部门上，半夜有人给他们贴上了一副对联，上联：“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”，下联：“昼工作夜工作昼夜工作”。这就是在封建社会人们对他们的评论。当时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深刻印象是，好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反封建破迷信，到处拉泥神像、剪长辫子和放小脚。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蒙童，根本不懂封建、迷信的确切含义，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，与同学们一起跟着学校的教师，拿着粗麻绳，缕缕行行地闯进城隍庙，在国民党官员的指挥下，争相爬上供桌，把绳索套在神像的脖子上，然后拽住绳子，如同在学校里拔河似地齐声喊着“一

二、一二”的号子，集中力量猛劲一拉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尘土飞扬，烟雾弥漫，霎时间人们被笼罩在一片浓烈的尘烟中，呛得咳嗽不止。一会儿，灰尘渐散，才看见一个个同学从满屋的尘土中露出身影，扑闪着两只光亮的眼睛，齜着一副白牙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禁嘻戏成一团，觉得非常开心。我们县城关的庙宇很多，天天去拉神像，课也不上了。有时我们看到站在远处观望的老人们，露出诚惶诚恐的面容，更加感到神气十足。往往一天要连续拉倒许多神像，财神庙、火神庙、玄帝庙、奶奶庙……都弄得狼藉不堪。老人都诅咒这些作孽的不会有好结果，我们则不予理睬，终日弄得泥猴一般。

谁知没有多久，北伐战争结束后，大刀会占领了县城，这些国民党的官员都逃得不知去向。大刀会进城后，另换了一个天下，一些善男信女，在乡绅头面人物的倡导下，筹措化缘，很快又把毁坏的庙宇翻修一新，新塑的神像金光闪亮，隆重的“开光典礼”，人山人海，鞭炮齐鸣，更加气派。想当初，老百姓本来就认为毁神像是一种亵渎神灵的罪过，唯恐神灵震怒降灾于人间，此时见到金身再现，纷纷怀着一种赎罪心理烧香磕头，香火极盛。我记得在城西门里的城隍庙中，不仅重新恢复了神鬼的原状，而且在城隍大殿里还塑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泥像，身穿白长袍、头戴白高帽的白无常鬼，吐着血红的长舌头，手掌下按压着一个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，这官员满脸可怜相仰面求饶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由此，还流传出了许多神鬼捉拿国民党官员的笑话。

男人留辮子是清朝统治者强迫汉人依从满族的习俗，女人缠小脚，则是自五代南唐以来在汉族妇女中世代相传的陋习。这不仅成了外国人耻笑中国人的大话柄，就连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，对此也深为不满，辛亥革命后也都自动地剪下了辮子，我小的时候就是光着脑瓜。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为表示革除旧弊，便带着

巡警局的巡警，拿着大剪子，巡行在市街上，只要发现了留辫子的男人，不由分说，上前拉住“咔嚓”一下，便把辫子剪了下来，随后，就吓唬着面孔，声色俱厉地喝吓一番，直到被剪掉辫子的人苦苦告饶，方肯罢休。当时，人的头发很值钱，国民党的官员积极性非常大，走街串巷地四处寻找，有的留着辫子的男人见势不妙，便不顾一切地撒腿逃跑，国民党官员紧追不舍，撵得鸡飞狗跳。有些本来已经剪掉了辫子的好事之人，恶作剧地弄来一些黑麻绳，编成假辫子，绑在头上，戴上一瓜皮小帽，以假乱真，引逗国民党官员追赶，因为是故意调理国民党的官员人们纷纷跟在后面起哄，把他耍得个不亦乐乎。最后，虽然还有一些人惜辫如命，无奈世风已变，拖着长辫已无法上街，只得在家中忍痛剪下了辫子。

唯有裹小脚的女人吓得不敢出门，国民党官员也拿她们毫无办法。到了抗日战争期间，日本鬼子下乡扫荡，来不及逃跑的女人常有被奸污的危险。日本兵到处喊叫：“花姑娘的有，赛古赛古。”被堵在家里的妇女，就是抹上一脸灶黑，也免不了被糟蹋。所以，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，女人便自动自觉地放开了小脚，不能不说是一出历史的滑稽戏！

三、我的觉醒

我上高小的时候，除苦读死板的功课外，能够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只有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呼延庆打擂》之类的侠义小说。那时，曲周城关仅在东门内有一家小书铺，字号叫“文明堂”，可实际上新派新思潮的读物一点也没有，只出售一些笔墨纸砚和旧的

章回小说、庸俗的小唱本。生活在这种环境里，我的思想活动的局限也可想而知了。

1930年秋，我考入邢台师范以后，不仅学习的课程门类增加了，学到的东西也大大增多了，学校里还有个卷帙浩瀚的图书馆，为我打开了认识人生的另一个世界。记得，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书，就是哥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又陆续阅读了郭沫若的《我的幼年》和蒋光慈的《战鼓》诗集，还有《拓荒者》等进步的新文艺书刊。这些在当时曾激起过无数热血青年昂然奋起的醒世之作，引导我的观念逐渐进入新思潮，书中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愤愤不平的呐喊，促使我把一双带有稚气的目光投向了光怪陆离的社会。

那时的邢台师范，是一座进步思想影响较大的学府，共产党在这里早已生根繁衍起来，共产党员的活动虽然是隐蔽的，但是许多学生可能是由于出身的原因，多倾向革命，学生演讲会、论辩会等各种进步活动十分活跃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，过着亡国奴的生活，举国上下义愤填膺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使校园中一片鼎沸，激怒的同学们立即组织起来，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在国民党部前呼口号举行演讲会。我们这些入学才一年多的新生，跟在高年级同学的后面，高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命令”“抵制日货”的口号，到商店查封日货，到农村动员民众抗日救亡，大家慷慨陈词，声泪俱下，素来不问国事的农民，也大声疾呼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。这次广泛的社会活动，使我思路大开，头脑中开始有了斗争，有了反抗的观念，犹如静静的一池清水的脑海里，掀起了汹涌的波涛，开始与同学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途径，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。

1932年春天，新学期上课不久，学校当局为了反对学生参加

抗日救亡活动，反对学生参与政事，竟把一名高年级的同学以共产党员的罪名抓了起来，要送交县政府处置。为此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当天半夜我还在沉睡，便被校园中响亮紧促的钟声惊醒，同学们闻讯纷纷奔出宿舍，寻问根由，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便一起跟着同学中的带头人找到了学校领导说理，在同学们的严辞责问下，校长理屈词穷，乘机 and 事务主任携款潜逃。学生就此闹起了学潮，首先把所有留在学校的教职员全部禁闭起来，然后各班选出代表，议定罢课游行。第二天，全校同学便浩浩荡荡地涌上街头，高喊“打倒校长胡×”的口号，到处张贴标语、散发传单，揭露学校的隐私和教师不称职等事。几天后，县政府当局和学校领导人见学生愈闹愈烈，便出动了大批警察，赶到学校，声言要接见全校教师，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企图把被困留在学校的教职员抢走。为此，谈判决裂，和学生引起争吵和冲突，警察恼羞成怒，强持教职员离校，并鸣枪威胁，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，和警察大打出手，我也跟着同学拿着一根球棍参加了斗殴。混乱中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一只耳朵竟被打了一个豁口，当时我正处于紧张的殴斗中，根本没有感觉到痛，仍然拚力地格斗着，有一位同学发现我脸上滴血，才把我送到医务室涂上点红药水，用胶布贴了一下。到现在，我的左耳靠头部上方，仍留着痕迹。教职员被劫走后，学生经济无着，断了炊，不得不撸树叶作代食，生活十分艰难。当地驻军是石友三的部队，正在此时，石友三从北京归来，学生便选派出代表到车站迎接他，并向他陈述了学生的遭遇。他听后马上委派参谋长到学校代为视察，对学生正以树叶充饥，厨房里堆着杨树叶深表同情，勒令县政府保证学生膳食费用，其它事情一概不过问。学潮随之得以继续下去。最后，学生终于取得了胜利，省教育厅派来了一个姓孟的新校长。

从这以后，我对共产党才有了朦胧的认识，开始阅读一些社

会科学书刊，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，认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腐朽和黑暗，感到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，不能死读书，学校也聘请一些思想进步的老师，象我们班语文教师晁哲甫、经济学教师袁××都对我思想有启发，联系现实生活，进一步明白世理，有了一种更高的追求。

随着我对社会了解日益加深，心灵中的追求亦愈加清晰。从而，产生了寻找共产党的愿望。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，党组织、党员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，共产党在哪里？我只能在我的周围细心观察。我们学校的印刷室有个工人老吴，我在和他的多次接触中感到他言行进步，很象共产党员，便隐隐约约地向他透露了我的愿望。几天后，老吴找到我说：“你敢不敢把反对国民党的标语贴在警察身上？”我当即回答：“那有什么不敢的。”随后，老吴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接受任务后，我琢磨了好久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星期天到了，我先写好了一张“打倒蒋介石！打倒国民党！”的小标语，在背面涂上浆糊，折叠好，装进制服口袋里，骑着自行车离开了校门。星期天正是邢台南关大集，街上的人缕缕行行，我一面骑着自行车向南行驶，一面四下观望着。当我驶近十字路口，发现一个警察正在那里背向着我指挥行人，我一见有机可乘，便紧蹬了几下自行车，停在他的背后，从口袋里掏出标语，搓开浆糊，顺手向他肩背后一拍，就把标语贴到他的肩背上，他一回头，我便佯装问路说：“去羊市街怎么走？”他手执警棒向西一指，我便顺着他指的方向疾驶而去。大约过了二三分钟，我见有一条向北去的胡同，立即登车窜了进去。回到学校看见老吴，我洋洋得意地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并得到了老吴的夸奖。当时，我十分欣慰，以为为革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正是执行王明的“冒险主义”路线的行动，是一种愚蠢的活动，那时若是因此被捕，坐牢或杀头，实在是太不

值得了。如果把这种革命的精神，用于同学间沟通心灵，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促进人们思想进步的工作，会实际得多。可在当时，我就是那么单纯，想到的只是革命，可对于怎样革命？又不甚清楚。不久，老吴同我们下班的李庆荣找我进行了正式谈话，宣布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由他俩直接领导。那是一九三四年秋季，具体月日我记不清楚了。

1935年开始，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狂，国民党警察经常在夜间到学生自习室搜查书籍，由于警察的文化程度很低，有的根本没有文化，不管书的内容如何，只见是红皮书，就一律没收。那年我们的数学教课书《三角》，正好装帧着红色书皮，竟也被搜走，闹得同学们哭笑不得。后来，由于学生的活动往往被告密，校长、训育主任常常在半夜领着特务到学生宿舍从被窝里抓人。白天里，有的特务冒充同学的亲友，让传达室的工友去把人找来，他们在传达室等候，见面就扣上手拷带走。有时，学校竟被军队包围，校门口支着机关枪，训育主任领着军官在校园中肆意抓人。学校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，同学间的接触言谈随之变得谨慎起来。

1936年，我从邢台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即失掉了组织联系，也陷入了失业的窘境，为寻找职业到处奔波流浪，饱尝了毕业即失业的艰难。
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在抗日热潮中，我在曲周联系同学中的进步分子，组织起“抗日锄奸团”，开始从事抗日救国运动。

翌年春，中国共产党在曲周成立了临时工委。5月，在郭政通和吕仲五同志的介绍下，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工委讨论批准我入党时，工委习从真同志提出：按党的规定，要给他三个月的后补期，郭政通是我邢台师范下班同学，他和李庆荣是同班，他略知我在校的情况，他说：他已候补了三年啦，不用再给

他候补期了。因此，我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了。

四、人 之 初

1937年七月，我经过一年失业的流浪，怀着继续深造的愿望，前往保定考学。可是，我刚到保定，便传来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。不久，日本飞机飞临保定上空盘旋侦察，城内人心惶惶，我想索回我的报名费及照片，招考处的人员却不知去向了。我只好躲在乡下的一个同学家观察动静。我听说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正在前线浴血抵抗，赵登禹的大刀队杀得日军心惊胆寒。后来，孙连仲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从南方增援到了保定。该部装备精良，各种大炮摆满了保定各学校的操场，官兵的抗日情绪很高。过去，当地的老百姓接触过的军队都是灰色军装，从未见过这种身穿绿军装、头戴竹斗笠，配有各式武器的部队。社会各界的抗日人士，也随之热情高涨，我也不禁产生了速战速胜的乐观情绪。

8月，前线战局剧变，平津失守，中国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，敌人步步逼近。老百姓乱成一团。我见考学无望，不得不回归家乡曲周。

此时，第二十九军也沿着平大公路（北平——大名）撤退到曲周。那一年，正值冀南大水灾，田野一片汪洋，尽成泽国。我们河东村紧靠公路，路过的部队和从前线溃败的兵马都要到我们县城吃饭、补充粮秣，彼此争相夺路，来往的人们都被挤塞在洪水中仅剩下一条狭窄大路上。日寇的飞机尾随而至，狂轰滥炸。记得最惨的一次是在十一月份的一天，正值曲周大集，恰有大部队进城，街道上军民混杂，拥挤不堪。正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二

十多架敌机向地面俯冲而来，疯狂地扫射投弹，剧烈的爆炸声，夹杂着敌机刺耳的怪叫，那声音难听吓人，在河东三官庙周围，霎时窜起道道火光，人们来不及躲避，被炸得血肉与砖瓦木石齐飞，惨不忍睹。老百姓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许多妇女被吓得两腿发软迈不开步，小孩哇哇哭叫。此后，居民们纷纷逃往乡下投亲靠友，城关十室九空。

国民党军队反攻失败后，县政府官员亦如鸟兽散，地方秩序陷于一片混乱，各地土匪蜂起，打村劫舍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。城东有个大土匪头子叫王来贤，手下步骑匪徒近万人，乘乱占领了曲周城关，恣意抢劫财物，奸淫妇女。强迫由城关绅商组织“维持会”为其筹措钱款粮秣，“维持会”会长刘老钦因为承受不住匪方无止的勒索，投河自尽了。各乡村财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，纷纷组织民团联合防守，也有与土匪勾结和携枪入伙的。后来，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出汉奸，收买拉拢土匪，将其改编成皇协军。在土匪撤出县城后，“维持会”内部的民族败类与邢台日军特务机关勾结，使“维持会”成了专为日寇奴役中国人的反动组织。

在这种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，曲周的共产党组织，由于领导人南逃，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，加上当时的地下党团员多为单线联系，彼此间很少往来，甚至没有往来，大家很难重新联络到一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彷徨，有人悲观，有人期待着。由于我不了解曲周县党团员情况，只得找到同学中的一些进步好友，经过串联，组织了抗日锄奸团，编写传单、张贴标语，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和“维持会”的反动本质，唤起群众抗日锄奸。在当时我们主要是活动在小知识分子群中，中间虽有一些党团员，却无法恢复组织关系，大家急切地盼望着能够得到党的领导。

翌年春，八路军东进纵队到了南宫县。闻讯后，大家决定派我前往联系。到南宫，我见到了八路军政治部民运科长刘铁石同

志，说明了来意，他热情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让我去到编辑部(冀南区党委的对外名称)找于光汉同志联系。我见到于光汉，意外地发现这位区党委的组织部长，原来是我在邢台师范的上班同学李怀珠。在学校时，由于国民党警察逮捕，他逾墙逃走了，几年不见，偶然在此邂逅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十分亲近。他听完我对曲周县社会情况的汇报，便指示我回去筹建曲周县抗日战争总动员委员会(简称战委会)，并在回家的路上找一找过去的老同学，动员他们出来参加抗日活动。离开编辑部，沿途我先后到了巨鹿县战委会、广宗县战委会(在件只镇)和威县战委会(在七及)，搜集了一些他们的组织章程和抗日十大纲领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宣传材料，并走访了一些在家中苦闷彷徨的同学。回到曲周后，便开始“招兵买马”，扩大组织，筹建战委会。

1938年3、4月间，八路军骑兵团二次到曲周，在他们协助下曲周县战委会正式宣布成立了，我利用小学拜把子兄弟苑君儒的关系，把他家的住宅——城内东街西福记一套深宅大院借了过来，挂上了战委会的牌子，由随军前来的肖一舟同志任战委会主任，不几天，他又随部队去广平县。谁接替他的职务，当时我们很费了一番脑筋，我们几个原来筹建战委会时的骨干，都人微言轻，在群众中没有号召力。经过商议，大家认为教育界的袁香南先生为人正派，颇有名望，又是我们的长者，处事能使人信服，便把他请了出来，担任战委会主任。

战委会下设：总务部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锄奸部、武装部和动员部，我被任作宣传部部长。那时，我们在忙乱中把机构健全起来，多是年轻人，只有一个心眼，就是把民众组织起来抗日，别的什么也顾不上。

战委会创立伊始，首先没收了一个汉奸办的打蛋厂，将其财物收为战委会资金，厂舍改做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办公地址。接

着又筹建青年、妇女抗日救国会，及各区战委会。那时，我带着一股青年人旺盛的热情，到处开会演讲，教唱抗日歌曲，忙忙碌碌地觉得十分畅快。同时，我还找木匠制造了一架油印机，印刷抗日小报，由我一个人自编、自刻、自印，内容多是宣传动员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有枪出枪，有人出人，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“抗战必胜，日寇必败”的道理，以及冀南各地打日寇，锄匪，锄奸的胜利消息。

开始时，战委会虽然设有武装部，却没有武装力量。战委会正式成立前，我曾独自一人到北门外火神庙去动员“维持会”武装头目张老尖拉出队伍参加抗日，老奸巨滑的张老尖，不好一口回绝，表面上装得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他也很愿意为抗日出力，但不知弟兄们怎么个想法，让我跟弟兄们讲讲。当时，我并没有料到这是一个圈套。谁知他把队伍集合起来，我刚说到国难当头，抗日救国人人有责，要说的话只讲了不到一半，队伍便哗然而散，弄得我十分尴尬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愤愤出门。后来八路军骑兵团到来，未及缴械，他们便自动土崩瓦解了。战委会成立后，我又通过胡宪章的介绍，先后找到了城东的陈访贤（共产党员）和城北的袁月林，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家庭，为了防匪各自都有武装力量。通过动员，他们同意带人带枪参加抗日，但谁都不愿意出面挑头。这时，我又想起了城南的阎景安，他是旧军人出身，枪法很好，被那一带财主推为兵团团长，手下有人有枪，和我有过一面之交。我找到他后，他一听让他担当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，是当官，当即满口答应。就这样，很快地组织起了一支百十人的抗日武装。

5月，组织上派习从真同志到曲周担任抗日县长。战委会帮助他筹建县政府班子，并协助他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，招收本县城乡的教员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，由我和习从真县长讲课，经过短期培训后，即分配到县政府各部门工作。那时，刚成

立中共县临时工委，我便在同学友好郭政通（原名郭风白）和吕仲五同志的介绍下，第一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组织机构不断健全，人员调整也愈加频繁。袁香南、陈致远陆续调走后，便由我担任曲周县战委会主任。9月闻悉日寇准备侵占曲周县城，战委会随即迁居河东村忠兴粮店，准备对付敌人侵犯活动。

7月份，中共冀南第三地方工作委员会（原称特委）成立（简称三地委）设在城北边的牛屯，组织决定调我到地委宣传部工作。部长吴兰田（后来投敌叛变）。当时，在地方党政机关中，人们的职务虽有区别，但对于职务名称，从来没有人称呼过，大家相互都习惯称呼同志，认为这是一种最光荣的称呼，彼此亲密无间。不管是领导还是公务员（那时叫小鬼），都是一个两元钱的津贴，衣食都由组织供给，患难与共，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。

五、藏书、葬书

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自感知识匮乏，对读书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，可以说是嗜书成癖。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，还养成了一种藏书的习惯，也曾搜集到一些珍本，可惜戎马倥偬，那些书籍又都毁于战火中。每每想来，遗憾不已，尤其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那段藏书葬书的经历，更是惋惜。

1939年，中共冀南三地委根据上级决定，选调十几名精干的年轻同志，组成了一个运输队，专门负责前往太行山搬运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文件、书刊。由于我对读书的喜好，每次运输队从太行